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协同

□关丽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让考核指挥棒真正管用”。“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如同引领发展的“指挥棒”，其指向精准与否，直接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效能。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并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深植于唯物辩证法精髓的战略性质重构，体现着对发展规律、治理逻辑与实践效能的深刻把握。

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考核导向的时代演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考核评价体系的演进，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它既是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理念的凝结，又在时代变迁中实现自我革新。

从“十一五”时期强调“增长优先”，到“十二五”时期注重“结构调整”，再到“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逐步确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考核体系的演变清晰映照出我国发展阶段的梯次递进。进入“十五五”时期，在解决“有没有”的历史任务之后，发展重心全面转向“好不好”“优不优”。与之相适应，考核评价体系也完成了从“速度情结”到“质量自觉”的根本性转变。

这一转变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原则一以贯之，确保考核始终服务于国家

战略大局与人民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等新要求深度嵌入考核指标，推动评价体系从单一维度的经济总量考核，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多维并重的系统评价。考核导向的历史性演进，正是我国现代化规律认识深化、制度建设的深刻体现。

矛盾运动中的战略协同：考核体系的有机统一

考核评价体系绝非孤立零散指标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由根本保证、价值立场、发展路径、制度支撑、安全保障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根本保证与价值立场：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的辩证统一。在考核体系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贯穿始终的定盘星，确保考核的政治方向正确、战略意图清晰；“坚持人民至上”则是考核的价值原点，要求所有指标最终落脚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以党的领导凝聚发展合力、以人民满意检验发展成效”的考核逻辑，使指挥棒既有力又温暖。

发展路径与制度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分类差异化考核的辩证统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考核体系的核心指向。然而，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各不相同，若以“一把尺子量到底”，则必然导致功能错位与激励扭曲。这就要求考核体系必须实现分类差异化评价——对优化开发区域，重点考核产

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优先”考核；对农产品主产区，突出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

动力机制与安全保障：激励创新与防控风险的辩证统一。高质量发展需要激发市场活力与干部担当，这就要求考核体系对改革创新给予容错空间，对“潜绩”给予充分认可。同时，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叠加交织的复杂形势，考核体系又必须强化底线约束，将政府债务化解、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纳入刚性指标。

在实践中检验中彰显战略效能：从考核导向到发展动能

唯物辩证法揭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考核评价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其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能。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挥棒，正在并将继续释放强大的战略动能。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高质量发展导向融入干部考核、绩效评价、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形成了“战略目标—考核指标—工作举措—成效评估”的闭环传导机制。这一机制确保了宏观战略能够精准转化为具体行动，国家意志能够贯通到基层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发展的实际治理能力。

发展韧性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下，各地不再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速，而是更加注重创新生态培育、产业基础再造、营商环境优化。面对外部打压遏制与内部转型压

力，这种“久久为功”的考核导向，有效引导资源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难而正确”的领域集聚，显著增强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并将这种韧性沉淀为基础能力、塑造为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民生改善转化为根基稳固。当考核指挥棒将“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率”“市场主体满意度”“高质量就业占比”等民生指标置于突出位置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便形成了良性循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考核评价的最高标准，凝聚了全社会奋进新征程的共识与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关键五年。深刻把握并自觉运用考核评价体系中蕴含的唯物辩证法智慧，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要求。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标志着我们党对治理规律、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不仅是方法论的集成，更是发展观与治理观的深刻革新。它必将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强大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我省基层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典型特征及纠治对策研究”（HB25DS012）；中央党校课题“地方治理领域中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现象：表征、生成逻辑与纠治机制研究”（2025DXXTQN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党校国家治理教研部)

□刘学谦 王珺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未来产业成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然而，未来产业的“交叉性”与“衍生性”使其呈现出复杂的演化特征：一方面，技术突破日益呈现多学科知识交汇、多技术体系渗透的深度交叉融合，导致传统产业边界日趋模糊；另一方面，从基础研发到商业应用的转化周期大幅缩短，持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与新模式，形成快速发展的衍生链条。这给传统的、基于清晰产业分类和稳定技术范式的监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因此，构建一套能够应对未来产业交叉融合与衍生发展特征的监管前置新范式，已成为关乎未来产业发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核心基础设施。

国家战略蓝图：未来产业交叉衍生的顶层导向

未来产业的“交叉性”与“衍生性”，不仅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国家顶层设计塑造新质生产力、赢得长远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支点。当前，我国已针对未来产业的“交叉融合”与“衍生发展”特征作出战略研判及系统布局，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框架。

国家发展规划的连续部署。自“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培育先进性和支柱性产业列为重点任务以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将其确立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举措。这标志着发展未来产业已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全会特别强调，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无一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新业态快速衍生的典型代表。由此可见，我国产业政策重心已超越弥补缺既有产业链短板的传统逻辑，转向通过制度设计、要素配置及生态营造，主动引导创新范式的形成与扩散，实现产业政策逻辑从“追赶补缺”向“范式定义”的根本跃迁。

专项政策的系统化设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是相关领域的系统性政策文件。该文件未采用传统产业分类框架，而是前瞻性界定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方向，其内涵深刻体现了交叉融合理念。文件旨在通过“打造标志性产品”和“前瞻部署新赛道”，主动引导并催化新技术的衍生应用，将不确定的创新过程纳入有组织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标志着未来产业已进入国家战略系统布局的新阶段。

政策协同挑战：交叉衍生引发的传统监管困境

尽管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清晰，但传统监管模式在应对“交叉性”与“衍生性”时更呈现出更深层次的“不适应症”，这正是构建监管前置新范式要着力破解的症结。主要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

监管条块分割与产业交叉融合之间的矛盾。当前，未来产业日益呈现出跨界交叉融合的特征，但现有监管体系仍基于条块分割的部门职责，难以适配交叉融合的产业现状。尽管政策层面已明确要求“部际协同、央地协作”，但如何将这一原则转化为高效、常态化的跨部门监管机制，仍是破解监管体系与产业边界不匹配难题的关键。

政策迭代迟缓与技术快速衍生的矛盾。未来产业涉及的新兴技术，持续催生全新的应用场景与商业模式，随之而来的社会、伦理问题及风险也在快速演变。但法规政策从问题识别、调研论证到修订出台，通常耗时冗长，难以同步响应技术迭代的速度。

静态准入许可与动态试错演进的矛盾。未来产业的发展本质上依赖于“设计”“测试”“迭代”的快速试错与动态演进机制，而传统监管多为基于既定规则的“事后”响应，静态的、高门槛的准入许可制度以预设标准和刚性规则为前提，难以在技术交叉融合与新兴业态衍生的“事前”及“事中”阶段提供适应性规则。

监管前置范式：面向交叉衍生的治理模式变革

面向未来产业的监管前置新范式，本质上是一种主动介入的动态治理模式，强调监管过程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调整与持续性学习，其核心是培育对未来产业“交叉性”与“衍生性”双重特征的自适应能力，从而实现前瞻性布局与敏捷性响应的平衡。构建监管前置新范式的四大支柱包括：

打造动态监测体系，实现对交叉衍生趋势与风险的超前识别。通过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及投资机构等多方数据资源，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构建跨学科的新兴技术知识图谱和国家层面的风险监测网络。

推广柔性监管工具，为交叉衍生提供制度化的“前置试验空间”。例如，“监管沙盒”主要用于测试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风险可控的真实市场环境。通过将沙盒理念制度化，并拓展到人工智能等新兴交叉领域，同时发展基于场景和风险的触发式监管模式，允许创新在真实场景中有限试错，有助于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包容性发展。

完善标准生成机制，推动“场景预研”与“产业协同”相结合的演进路径。面对未来产业交叉融合与快速衍生的新技术与新业态，应从刚性的“产品标准”转向聚焦核心价值的“性能标准”或“原则标准”。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打造规则共议的监管前置生态。系统总结沙盒试点、地方试验中的经验教训，建立政策预案的模拟推演与更新机制，使监管体系具备从前瞻性研判中持续学习、提前校准的能力，真正实现“在进化中完善”的监管前置范式。

关键实施路径：推动监管前置落地的政策建议

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监管前置从理念范式转化为实践方法，有效破解其“交叉性”与“衍生性”带来的监管挑战，建议从以下路径着力推进：

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打造监管创新特区。在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高新区或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监管创新特区”，通过系统性综合授权，赋予其在数据跨界流动、跨领域产品准入、新兴技术标准试点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权。

建立未来产业政策预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设立跨学科、跨部门的常设咨询机构，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低空经济等高衍生性领域进行持续跟踪与模拟推演。聚焦技术交叉融合可能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开展前瞻性影响评估，破解因知识壁垒导致的监管滞后或误判难题。

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提升监管精准性与响应力。加大监管过程中的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风险监测、合规自查和智能预警中的深度应用。

强化金融财税政策的精准滴灌与风险共担。引导政策性金融、产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将资源重点导向未来产业交叉衍生领域的初创企业与跨界项目。

【资助项目：2025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省未来产业研究报告”（JRSZ-2025-01005）】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 河北省东北亚经济合作研究基地)

投稿邮箱：hbjrbl@163.com

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自主话语体系

——评《中文“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国别调研报告》

□刘少坤

在全球语言传播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已逐渐成为我国对外人文交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快速发展的实践规模相比，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如何在国际语言传播理论框架中确立中国立场，如何在复杂多元的国际语境中形成具有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话语，成为当前学界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冯鸿彦教授所著《中文“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国别调研报告》，正是在这一学科发展关键阶段推出的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著作。

与一般经验总结型著作不同，本书以“一带一路”沿线西北非洲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国别调研和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国际中文教育在不同政治制度、语言政策与社会文化

环境中的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国际中文教育推广策略的构建路径，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理论概括力的分析框架。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在研究“中文如何走出去”，更是在思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如何走向成熟”。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强化了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作者并未简单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层面，而是围绕本土化发展、市场化运行、“中文+职业技能”融合以及传播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展开系统论证。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从“经验呈现”向“理论阐释”转型。

在理论视野上，本书既关注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也主动引入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等国际语言推广机构的经验进行比较分析。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对照研

究，使国际中文教育不再是单一语种内部的问题，而被纳入全球语言传播格局之中进行审视。通过这种比较视角，作者既吸收国际成熟语言推广模式的有益经验，又保持对中国现实条件的理性判断，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与学术定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始终强调国际中文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教学行为，更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这种将语言教育置于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框架中思考的视角，有助于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战略高度，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语言传播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学术表达层面，本书语言严谨、论证清晰，既具有政策研究的现实关怀，又保持了学术著作应有的规范性。尤其是在对国别教育生态的分析中，作者注重数据与事实支撑，避免

简单化判断，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可信。这种理性务实的学术态度，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树立了良好范式。

总体而言，《中文“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国别调研报告》不仅是一部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调研著作，更是一部在学科层面具有建设意义的研究成果。它通过扎实的国别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话语表达方式，对于推动该领域形成更加成熟、自主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中文教育由“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这部著作所展现出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担当，无疑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本书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将在更广阔的国际语境中发挥持续影响。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加快构建公平可及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赵晓雷 杨士铎 崔月斯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增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支持有条件的综合性医院发展医养结合服务。支持有需求的乡镇卫生院完善设施条件，扩大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供给。”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9%。表明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对高质量的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政策指引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加快构建公平可及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老年群体民生福祉的关键。

打破资源分布的“倒金字塔”结构，推动医养结合资源整合下沉

当前，推进构建公平可及健康养老服务的首要障碍是优质医养结合资源分布不均。就目前医养结合资源分布情况来看，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专业医养结合机构等优质医养结合资源主要聚集在城市。而广大乡村地区的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数量较少，尤其是优质医养结合资源短缺。为此，在资源布局上，要着力推动资源下沉，通过建立紧密型医联体，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区域医疗服务协作机制，将优质医疗资源辐射至乡镇和社区，实现医疗资源共享。

完善支付保障机制，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经济可及性

现行医养结合服务支付主要依靠医保报销和老年人个人支付，医保报销多局限于疾病诊断、治疗等相关服务，而在医养结合机构中发生的日常护理、康复服务、失能失智照顾等服务费用尚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为此，需要完善支付保障机制，合理调整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适度扩大医养结合服务项目保障范围。在确保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探索将医养结合服务中的日常医疗护理、康复护理等项目纳入医保目录，减轻老年群体的支付压力。

聚焦医养结合服务需求，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精准供给能力

现有医养结合服务以基本生活照料和基本医疗护理为主，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诊治、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个性化服务供给不

足。从供给层次来看，社会资本投资兴建的医养结合服务多偏向高端项目，而面向低收入、失能失智等老年群体的普惠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明显缺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合理规划医养结合服务布局，政府应根据区域老年人口结构和服务需求特征，科学规划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布局与功能定位，增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

健全人才保障体系，破解医养人才匮乏难题

医养结合服务从业人员绝大多数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具备医疗护理、康复服务、精神慰藉等专业技能的人才匮乏，严重影响医养结合服务质量。为此，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医养护理人员面向医养结合服务机构从业。首先，提升薪酬待遇。建立与医养结合服务工作强度、专业技能相匹配的薪酬体系，参照公办医疗机构护理人员薪酬标准，合理确定医养结合机构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其次，畅通医养结合机构从业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专业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破除职业发展“天花板”，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职业吸引力。最后，改善社会认同。加强社会宣传引导，破除社会公众对医养结合服务职业的刻板印象，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职业的社

会认可度和职业荣誉感。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障医养结合服务可持续

医养结合服务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日常运营，如场地建设与维护、医疗设备购置、医护人员工资保险等。当前医养结合服务资金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等多元化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医疗服务具有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抑制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为此，要构建多元化的医养结合服务资金筹集机制，破解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难题。

构建公平可及的医养结合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群体医养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的战略选择。面对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挑战，唯有通过推动医养资源整合下沉、完善支付保障机制、聚焦医养服务需求、健全人才保障体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等措施，方能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让健康养老更公平可及。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大健康理念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课题编号：BJ2025TJ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赵晓雷，石家庄学院；杨士铎，雄安澹谥科技有限公司；崔月斯涵，天津外国语学院)